

上海市工商联温州商会“人文东方”学术演讲系列(1)

人文精神 工商文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精神与工商文明：上海市工商联温州商会“人文东方”学术演讲系列(1) / 杨介生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ISBN 978-7-80745-523-3

I. 人... II. 杨... III. 人文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6179号

人文精神与工商文明

——上海市工商联温州商会“人文东方”学术演讲系列(1)

主 编：杨介生

责任编辑：沈 洁

装帧设计：白玉琼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5.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523 - 3/C • 027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上海温州商会创立于1999年，至今已历十载春秋。自创立以来，商会的历任会长、副会长和会员们都秉持同一理念，一个好的商会能够成功地实现商会成员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的总体提升。为此，商会不仅应致力于促进经济合作与交流，还要着眼于塑造和树立温州人的新思维、新形象。

永嘉史重人文，故今日温州仍继文气兴盛之景象。温商群体乘改革开放之风迅速崛起，世人誉之“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温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新概念，生于草根、长于微末只是状态，温州的人文传承在这个特殊群体的身上以另外一种方式茁壮地延续、生长。上海是故土之外温商群体最为集中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万温商先后来到上海创业发展，如今已有21万温州人生活在上海，开办企业达2万余家，共同为上海的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温商成为上海国际化进程中屡屡提及且不可忽略的名词。

上海温商，包括世界温商，有三个宝贵财富，就是商业网络、商业经验以及精神传统。世人对温商的前两个宝贵财富，赞许和研究都相当多，而对温商所持的精神传统，却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种忽略，既源于人们更为关注和欣赏温州人在商界的传奇，也来自人们对我们温商在一些场合中在商言商之表现产生的片断印象。内在的精神文化传统，是温商近年来驰骋商界的精神根基，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大背景下，世人，包括一些温商自己似乎对此有些漠视了。

自古以来，“商”一词有着多种含义，除了最常用的“经商”之意，还有“协商”、“揣度”等多重意义，而无论哪一种含义，其核心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人文精神是人类的自我关怀，具有普世性，表现为对人类集体和个体的尊严、价值、命运的追求和关切，对经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尊重和珍视，对全方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这么说并不夸张。人文精神没有直接的功利效用，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这使得相当多人长期以来形成误解，认为探讨人文精神是坐而论道，无以利国安民。实际上，人文精神是一种

永恒不灭的价值和意义体系。放宽历史的视野，为人或为商，若无人文精神，则惘而殆。

上海温州商会成立以来，曾多次举办经济和商业类的论坛和讲座，这些活动卓有成效，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给予我们的会员直接知本收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效应对经济建设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科学技术是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人文精神就是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身为当代企业家，只有不断自己丰沛自己的人文精神，才能更加高屋建瓴地切入社会、报效社会。对文化软实力在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很多会员都有越来越深的体会。过去的30年，是我们温商的起步和发展阶段，在重商文化的氛围中，温商群体书就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而今后的岁月，温商将在坚实的基础上不断进取，走向永续发展，商文并重，以文促商已是势在必然。

上海温州商会是海内外温商乃至整个温州市引外联的一个桥头堡，是众多会员在上海的家，在推动在沪温商群体对人文精神的追寻和体察、带活我们温商群体的人文气韵方面责无旁贷。为此，商会有了举办“人文东方”系列讲座的动议，希望邀请中国学界卓有建树的学者来到我们商会，请他们将治学几十年的心得体会融入在讲座中，春风化雨，为我们带来深层的思考、感悟和启迪。在知识涵盖方面，我们希望各期讲座的主讲人应来自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

第一位应邀前来的学者是著名历史学家朱学勤教授。2005年5月22日下午，上海西郊迎宾馆的会议厅里座无虚席。朱教授在讲座中气势如虹，将工商文明的过去、现在娓娓道来，也让在座的各位陷入了对工商文明的未来中自己所处的地位、应尽的责任的思考。会后，大家与朱教授的互动出乎意料之外地热烈，大家纷纷提出自己的问题，谈及自己的思考，而朱教授从他的学科角度和人生境界所作的回答则令大家或耳目一新，或深受启发。此后，著名哲学家、作家周国平先生自北京而来，为我们诠释了《企业家与哲学》之间的内在理路；西方哲学的学科带头人、长江学者俞吾金教授直指人心，论述了企业家的认识与超越之道；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吴晓明教授对人文素养与精神安居溯本求源；上海世博局副局长周汉民教授就上海世博会与城市发展侃侃而谈，催请大家思考人与城市的关系；哲学王子王德峰教授

则以诗一般的语言解读了企业家的哲学境界；在党的十七大成功召开之后，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桑玉成教授则及时对其进行了解读，重点剖析了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城市规划权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前院长陈秉钊教授将自己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事城规设计数十年而生成的思考，浓缩成“安居乐业话理性”；“5·12”汶川大地震后，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孙景尧教授通过回顾历史上中外文学中的灾难作品，唤起大家对灾难中人性的思考和追寻；2008年7月，《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周瑞金纵论中华文明精神与企业家如何善待人生。

3年过去，“人文东方”系列讲座已举办10讲，这10场讲座均引发了企业家们的高度兴趣和积极回应，在每一次讲座嘉宾与企业家的互动中，我们的企业家们结合自己的事业和人生，提出问题、表达感想，和与会学者展开深度沟通和探讨，进而继续深化讲座引发的思考。人文精神似水，商业精神如渠，在岁月的行走中，水到而渠自成。

过去3年来，“人文东方”系列讲座见证了我们上海温州商会发展的历程和我们在沪温商思想的变迁、前进的足迹，为此，在上海温州商会成立10周年之际，应广大会员的要求，商会决定将“人文东方”系列讲座的前10讲结集出版。从上海温州商会和整个上海温商群体的角度来说，这将是我们将继续着眼于科学发展、着力于提升人文精神的新起点。

杨介生

2009年5月于上海临虹路128弄8号锦丽斯花园

目 录

杨介生	序	1
朱学勤	第一讲 工商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01
周国平	第二讲 企业家与哲学	017
俞吾金	第三讲 认识与超越：成功必由之路	039
吴晓明	第四讲 人文素养与精神安居	073
周汉民	第五讲 上海世博会与城市发展	103
王德峰	第六讲 企业家的哲学境界	129
桑玉成	第七讲 解读十七大：经济增长与政治发展	169
陈秉钊	第八讲 安居乐业话理性	187
孙景尧	第九讲 留得真爱在人间	197
周瑞金	第十讲 中华人文精神和企业家如何善待人生	213

第一讲

工商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005.5.22



工商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朱学勤，1952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1972年进工厂做工。1985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任教于原空军政治学院，自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编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被批评与被遗忘的》、《热烈与冷静——林毓生学术论述集》等。近年来，多次出访欧美及我国港台地区，先后作为访问学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并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迪金森学院作学术讲演，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大会主题发言。

按照学校里的习惯，你提出一个问题，立刻需要给问题下定义。在座都是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我想没有必要从定义开始。当我说工商文明的时候，在座的各位都会结合自己的经历，这比定义丰富得多。所以与其从定义开始，不如从历史上工商文明是怎么被发现、怎么被肯定这个历史过程开始，把这个历史过程勾勒出来，没有定义，胜似定义。

一、工商文明的历程

回溯工商文明是怎么被发现、怎么被肯定，其实是穿越近代思想史、近代政治史的一个历险过程。一些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判断、说法和意见，当时提出的时候几乎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惊世骇俗的。

工商文明的对立面就是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禁欲主义。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是神学统治时代。二元状态，精神向上飞跃，肉体向下沉沦。肉体是被欲望这个魔鬼主宰的。中世纪花了1000年时间以道德抑制欲望，抑制了1000年，却以失败而告终。在中世纪终了的时候，人们惊恐地发现，欲望如同野火一般在每一代人心中重新燃起。欲火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总是要重新燃起。

中世纪是道德与欲望搏斗的1000年，在最后两三百年，铜墙铁壁逐渐裂开了缝隙，最早是在意大利。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很多文艺复兴的小说、戏剧只是解放了情欲，就是异性之间两情相悦的感情，至多是解放个性，人们在解放情欲个性的同时，对工商活动还是抱有偏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在他笔下，从事工商文明的威尼斯商人是丑恶的，是无恶不作的，是人类的害虫。

15世纪以后，在苏格兰爱丁堡地区，一些很低调的思想家在炉火边窃窃私语，开始了他们的启蒙活动，这一群人在禁锢工商文明的道德的铜墙铁壁上开始打洞，开始突破。

1. 消极肯定：用“利益”诱惑人引导人

突破1000年对工商文明的偏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消极肯定，第二个阶段是积极肯定。

消极肯定是什么意思呢？先不说工商文明是好的，说工商文明是一种恶，但这种恶呢，相对其他恶来说它更容易驯化而且拿这个恶来抑制其他的恶会有意外的效果。这个时候人们并不是在道德上给工商文明正名，而是说，虽然是个坏东西，但是呢，用这一欲望来制服其他欲望，比如说，对权力的欲望，做英雄的欲望，牺牲千百万人生命成就一人之帝王伟业的欲望。用发财致富来抑制它，要比其他东西来抑制它成本低，可预期性强而且恒久稳定。当时为了给这个能抑制其他欲望的欲望一个新的说法，出现了一个新词，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利益。中世纪的时候是不能说利益的，现在提出来了。利益提出的时候还是个贬义词，但是它有客观的好的效果，因为它是驯服中世纪一直驯服不了的各种欲望的欲望。人们第一次发现用道德驯服欲望驯服不了，后来发现需要从各种欲望中提炼出一个，用它来驯服左右，这个东西被称为利益。一开始这样说的思想家有马基雅维利，还有霍布斯。霍布斯是英国人，给英国国王做过数学教师。这个用欲望制服欲望的思路与当时政治上悄悄开始的另一个思路呈平行态势。

当时政治上悄悄出现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道德制服不了权力，能制服权力的是什么呢？权力本身。这就是后来民主思想的萌动，用权力制约权力比用道德制约权力更有效。那么在社会思想里面，与之平行不悖也发现用欲望制服欲望同样有效。所以到了17世纪的时候，英国广为流传的一个名言是利益不会撒谎，用利益来诱惑别人来引导人，利益不会让你走弯路，所以说利益不会撒谎。到18世纪法国人讲，就像物质世界用运动定律来支配一样，道德世界不是被道德支配，是被利益定律支配的。这个是对工商文明道德形象的消极肯定。这就到了第二个阶段：积极肯定。

2. 积极肯定：“看不见的手”促进社会公益

积极肯定是划时代的转折。1775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那是工商文明的“圣经”，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实际上在这一主张提出以前的半个

世纪，英国人曼得维尔写过一篇像寓言一样的文章，叫《蜜蜂的寓言》。他观察蜜蜂的活动后发现，每一个蜜蜂都采花啊，酿蜜啊，但它根本不知道它的活动跟其他蜜蜂混合起来的最终后果是什么。当然，蜜蜂活动的最终后果是造福于人类公益。所以他最早用寓言写出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就是人类的私利活动能导致社会公益。半个世纪以后，亚当·斯密接过这一说法，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的过程是每一个看得见的肮脏的只想给自己发财致富的手汇合而成的，但是这么多看得见的手上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就是每个人为着私利进入社会过程，最后出现了大家都没有意料到的后果，这就是社会公益。亚当·斯密所言看不见的手是对工商文明的道德性、社会公益的一个正面肯定。从此以后，人们开始正视工商文明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

二、工商文明的社会价值

第一个价值是自由。“五四”以来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我稍后会进行批评。英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是贴着地面步行，认为自由是由保护财产权而来的。洛克对财产权与自由之间联系的论述，根本不像我们熟悉的“五四”以来作家小说里讲到的那种联系。他说：“一个人面前有面包，有衣服。而且规定衣服和面包都属于他个人所有，但是如果剥夺他自由支配面包和衣服的权力的话，那么这个人他面前有再多的面包有再多的衣服的话，他要饿死，他要冻死。”他认为自由与财产权的联系是人们可以自由处置支配财产权利的这个权力。所以英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是与产权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跟个性、跟“五四”以来我们所信服的那些精神观念上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价值就是民主。人们发现工商活动与民主之间形而下的紧密联系有很多环节。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汇票。各位朋友对汇票的使用理解比我要深刻得多。历史上汇票是怎么发现的呢？汇票是为了躲避封建君主横征暴敛，就是法律之外的任意征税行为，而发明出来的把不动产变成动产的办法，就是把几千两乃至几万两黄金变成一个纸面上的数字。这个纸面上的

数字可以到世界其他地方兑现和流通。当时，汇票的出现不仅是商业活动的召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躲避封建君王的横征暴敛。工商阶层为了与当时欧洲的军权对抗、保证自己的利益，有很多工商技术的发明，而汇票具有终结的划时代意义。今天的历史学家把汇票出现的意义等同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第三个价值是联合。工商文明出现以前，人类是生活在农村状态、分散状态。分散状态导致的就是农民反抗暴君的叛乱和起义是很容易被扑灭的。工商活动把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如果城市里的人联合起来反抗封建君王的专政，那么封建王权不可能利用此起彼伏的时间差来分别扑灭，这就是我们在18、19世纪历史中经常看到的工人运动、街头冲突。政府对此无可奈何，然后只好让步。这样一些例子，为什么此前1000年没有出现呢？因为工商文明的活动改变了人们的居住方式，从分散变成了联合，从农村变为了城市。

第四个价值在于，哪里工商活动活跃，哪里的人们就变得和善、和气。这一个意思从法语里面很难翻译，而在中国的工商界里，一句口头禅早就把它表达出来了——“和气生财”。商人在一起最喜欢说的是和气生财，而不是好斗生财。好斗并斗争生不了财，和气才能生财。做生意的朋友天然就知道这一点。17、18世纪以后，哪里的商业获得了发展，哪里的风俗就变得温和、文明、文雅、讲道理而不好厮杀。对此，法国人用了一个新的名词来描述。和气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生活在南中国，生意所及，经常要到北方，比如说东北，20年前这个感觉要更强烈一些，20年以后由于工商活动遍及大江南北，感觉在弱化，但区别本身是存在的。一般认为，北方人好斗，三句话不对，一拳就打上去了，到了南方，比方上海，长久以来，北方人看不起上海男人，认为他们太窝囊，在公交车里面发生争执，你骂一句，我说一句，说半个小时没一个动手的，那北方人就要说那你打呀！这一现象实际说明了南方因长期商业活动而形成的区域性心理，人们比较和善，讲道理，驯化了古代和中世纪生活当中的野气、蛮气，这是商业活动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一个正面价值。

这一价值不仅保证商人赚钱，和气生财，它逐渐渗透到

政治生活中，给近代政治带来了政治文明。文明政治讲究妥协、多赢、共存等政治斗争的原则。非文明的政治，也就是古代政治、封建政治，有一句话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输不得，古代的人输不起。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就是我存在，你也存在，就算我们之间要分一个胜负的话，那也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友，改掉这个寇，变寇为友，大家同时存在。这是工商活动形成的和气渗透到政治生活中，为它增加了文明因素。

第五个价值是信用。人类生活并不是突然变成今天这种全球化状态的。文明生活起初活动半径非常小，以血缘为半径，不是自己本家的人不敢跟你有交往；以宗族为半径，不认识的人不敢做生意。到今天，各位可以跟法国巴黎的温州商人做生意，甚至跟语言不通的法国人做生意，跟意大利人做生意。这样一种远距离的分工协作的基础是什么呢？信用！信用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整个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在信用这个轴上打转，并由此而建立起来。这个社会如果没有信用的话，从明天早上开始，所有商业活动都要瘫痪，人类肯定要倒退到以物易物的蛮荒状态。信用是怎么出现的呢？也只有靠商业活动，像蜜蜂一样经营，经过几百年最后形成。陌生人之间签一个字，这个字代表几百万、几千万，也能凭此发货，这是近代交易的原则。

第六个价值是繁荣。马克思都承认，工商文明建立以来的那100年中，它所创造的财富超过此前人类几千年创造财富的总和。市场经济的成功，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就是成功地减少了交易成本与对人民新需求的发现与满足，这才是市场经济成功的秘密。

三、工商文明与革命

在人类近代历史中，与工商文明联系紧密的是一种革命。联系远的是另一种革命。接下来我谈谈这两种革命及两种结果。

1. 英美革命：工商化的政治性格

第一种革命是法国革命，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美国革命。

英国革命经过48年长期的拉锯，最后在1688年画上句号。我们教科书上把1688年英国革命的结局称为是妥协，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其实，这恰恰是因为工商文明在英国最发达，积累的影响政治因素最多，从而成为政治性格工商化造就的一个最好结果。

英国人自己认为这是光荣革命。为什么光荣？第一，前48年，年年流血，到1688年，一锤定音，此后长治久安300多年，英国没有第二场革命。自1688年开启的英国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是光荣的。妥协，双赢，敌我共存。1685年，当时在位的国王詹姆士二世开始着手改变48年革命当中形成的很多社会关系，包括财产分配和人们的宗教信仰。那时候，人们希望他赶紧死，换一个国王，自然淘汰，因为他已经六七十岁了，没有儿子，人们盼着换一个开明的国王。到国王六七十岁的时候，宫里传出一个消息，说是国王晚年得子，一位未来的国王出生了。人民怀疑这个孩子是假的，是外面的野种，是国王通过收买一个扫烟囱的工人，用一根棍子从烟囱里面传进宫里，给国王做接班人，所以不承认。英国资产阶级到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不走暴力的路，而是提出了一个不流血的办法。老国王的女儿玛丽远嫁到荷兰，她嫁夫从夫，宗教信仰从旧教变为新教，这与大多数工商业者是一致的。于是大家想办法把她邀请回来，干脆把女婿一块儿请回来。他们一回来以后，国王与议会的关系从此确定。没有革命出现，称为“光荣革命”，王室这个制度保留了君主制，但主权在议会的革命成果也保留下来，形成了英国到现在还长治久安的制度。

美国革命赶走了英国人，1778年的《费城宪法》是工商文明对人类政治文明最杰出的贡献，是用欲望制衡欲望的杰作。教科书上常说，美国制定的宪法妥协而不彻底的。实际上，恰恰是因为有衡者方有恒心。所以“费城宪法”的政治性格与法俄革命不一样，参与者大部分是工商业人士，惟独没有在法俄革命中经常看到的激进文人的身影。它不是知识分子引导的革命，它是工商业者引导的革命。工商业者的这种利益计算带进政治制度的设计当中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实行了三权分立，议会最高，主权在议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不分大小

州，人口多寡，每一个州有两个席位，而在众议院以每个州的实际人口计算拥有的议席。这样一来，就公平合理了，但计算到南方黑奴时，问题又出现了，南方人说，应该把黑人也作为议席计算的基数，北方人当然不同意。南方靠人力，收入靠农业，北方靠工业，南方人多，北方人少，而南方人多就多在黑奴上。这种情况，如果在法国或俄国肯定早就打起来。但是，工商业者惯于把分歧换算成为小数点后的利益单位，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是1个黑人算3/5个，南北双方都同意。有很多好例子都反映了这部宪法的文明因素。由于参加英美革命的大部分是工商业者，他们中间有分歧、有斗争，却不是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化解的。

2. 法国革命：激进文人引导全面革命

第二类是法国革命，1789年开始，到1791年进入最后阶段，即雅各宾专政。雅各宾的领袖大部分是非工商业者，是激进文人。他们把革命引向社会，用社会革命的成果来保护政治革命的成果，把它扩大一圈到社会革命后，他们发现财产分配的思想还在，于是雅各宾专政又将社会革命引向文化领域，1793年至1794年统治期间还开展了文化革命。这些中国人听来如闻故人，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辙，向人心宣战，向人性宣战，要塑造一代新人。然而，这种极端做法不能保卫革命不败，革命走到这一步即与世人为敌，最后雅各宾派成为孤家寡人。法国革命之所以成为悲剧，还在于它是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竞赛。

英国的方式与法国的方式在上海的英租界与法租界也有反映。英国人在外滩、南京路这一带成立租界，首先成立纳税人代表大会。白人要治安，要当局输出公共产品。然后制定出章程，一是有关安全，二是有关秩序，三是有关自由。做生意要打通各种壁垒，四是有关限制。法国人也搞法租界，不讲法制或成立董事局，不对纳税人负责，而是对法国领事馆负责，对最高官员负责，这导致法租界治安最混乱。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黑社会的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最早都是在法租界起家的，最后身份漂白到英租界要像模像样做文明人士。这与两个国家与工商文明的远近有关系。